

# 为新中国设计“国家形象”的人



周令钊

## 人物春秋

“在我而立之年，我们为之一奋斗十余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从参与成立建设，到见证祖国成长强大，风风雨雨70年。如今，我已经100岁了，唯愿我们的祖国明天更美好，我们的人民文明、健康、幸福。”说这话时，周令钊与朋友们的画展正在北京展出。这个画展是庆生，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更是一位百岁老人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生日贺礼。

## 周令钊是谁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帽的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至人民大会堂的“满天星”穹顶等等，都是他亲自绘画或参与设计的。而这，只是他众多作品的“冰山一角”。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油画《韶山》，记录反映新中国不同时代气息的招贴画、邮票、徽章，以及一些现在随处可入已深入百姓生活的各种标识……

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这样评价周令钊，“他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使国家意志视觉化，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风貌。”

## “山那边的好地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母亲郑家一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师范班，是徐特立的学生、杨开慧的同学，画水彩、绣样，并喜作诗。受母亲影响，周令钊从小就喜欢画画。13岁进入长沙华中中专，期间参与国货公司广告设计，贴补家用。后从湖北武昌艺专毕业，又在上海华东美术印刷传习所学习修版、制版等，专科学习和大量的社会实践为年轻的周令钊在实用美术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8年，在同学带领下，周令钊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时，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都曾在此供职。那年9月，周令钊参与了全国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也是在那时，美术科隔三差五便会“少了几个人”，周令钊一打听，说去了“山那边的好地方”。他心里清楚，那是一个无数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一天，当听说冼星海也要“去北边”时，周令钊坐不住了，请求他带上自己。冼星海告诉周令钊，“去找田汉批‘路条’，到‘八办’换‘通行证’，才能买票。”那个夜晚，周令钊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找到田汉。这个“遗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周令钊在创作第二套人民币时，跟随印钞厂去延安宝塔山采集设计素材时才得以释怀。

## 设计国家形象

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周令钊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1950

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汀、张光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计是一个集体创作。”周令钊说，自己当时提出“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致”的建议被采纳。“五颗星给天安门赋予了新含义。天安门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是新中国国家标志性建筑，又曾是旧时代皇城的建筑，在天安门上空升起新中国国旗的五颗星，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新中国国徽中的最基本的图形组合。”女儿周容说父亲不止一次跟她交流过国徽上五星设计的深层意义。

一次，当听说韩美林在清华美院给学生做讲座谈到“满天星”创意时，周容才知道，人民大会堂穹顶灯光“满天星”的设计构思也是出自父亲。韩美林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那是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在紧张建设当中。当时正在民族文化宫建设工地参与美术设计工作的周令钊接到通知，让迅速到中南海参加重要会议。受制于当时交通条件，参会人员迟迟没有到齐。等待中，按时抵达的周令钊便主动向周总理询问，得知原来是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穹顶吊灯设计安装遇到了难题。

之前在政协礼堂施工中，吊灯因承重问题坠落，造成几十个座椅损坏。而号称“万人大会堂”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高度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得多。“按照比例，建筑承重怎么解决？”周总理说。

周令钊有个习惯，随时随地不离手画速写。听了总理介绍，他说，“这个容易，满天星，满天星嘛……”随手用铅笔在稿纸上画出了众星环绕“五角星”的“满天星”设计草图。周总理接过草图，连说，“好！就是它了！告诉大家别来了，散会！”

韩美林在文章中写道，“按照周先生的方法，不但突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理念，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易于实现，美观简洁、突出主题，令人拍案叫绝。除了众多的实用美术设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周令钊创作的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主笔设计的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和展览；他的油画作品《韶山》收藏于全国政协礼堂。

曾经一幅或几幅作品名扬天下的大家比比皆是，如雷贯耳，然而周令钊却始终选择默默无声。“他就是那么朴实、厚道、谦和的人。我以为，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定是位老实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图名、不图利、不取巧，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黄永玉如此评价老朋友。 □晓玲 魏梦佳

# 投身革命舍小家 报国为民取大义

## ——读刘伯坚烈士家书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这是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烈士就义前写给妻子王淑振的最后一封家书，字字句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字里行间浸透着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 舍小家为大家、舍小义取大义

刘伯坚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赴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底，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被推举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1926年8月，刘伯坚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于1928年重返苏联学习军事，期间出席了中共六大。学习结束后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革命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初，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围，在战斗中身中数弹，不幸负伤被捕。3月21日，刘伯坚英勇就义。

刘伯坚在狱中共写下四封家书，其中三封写给妻子的兄嫂，一封是写给妻子的绝命书。在他留给家人最后的书信中，言词间饱含拳拳父爱、鹤鹤情深，真实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舍小义取大义的情怀，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一心报国的坚定信念和赤胆忠心。

不怕牺牲、一心报国的信念，为民族复兴大业而慷慨赴死，刘伯坚用生命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和信赖的最重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凝聚起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 坚守崇高理想信念与追求

由于工作需要，刘伯坚不得已与家人分离，舐犊之情更是让他对三个年幼的孩子非常想念。在写给嫂嫂的家书中，刘伯坚多次提及孩子，信中详细描述和记录了两位幼子托付的地方和人家。这背后是一位身为革命者的父亲的深深牵挂，也表明斗争形势的艰难。

刘伯坚的家书不仅饱含牵挂，还对孩子提出殷切期望：“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

刘伯坚为三幼子所设想的人生之路，不是追求大富大贵、功成名就，而是希望“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在给妻子的绝笔信中，刘伯坚不忘嘱托把孩子养育成人，希望爱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多年后，刘伯坚的二儿子刘豹生仍能回忆起自己被送走的那个夜晚，腿部受伤的父亲拄着拐杖站在漆黑的山间小路上，他哭喊着不愿离开的情景。他也曾埋怨过父亲的“狠心”，但在一遍遍重读父亲的家书后，渐渐读懂了父亲的赤子之心：有国才有家，父亲的爱是大爱，是一种超越于家庭之上的家国情怀。

刘伯坚用行动坚守崇高理想信念与追求，不仅为他的孩子示范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使命与情怀，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继承和发扬红色革命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红色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大任。

##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刘伯坚在家书中预见到了人生即将终结，但他坦然接受这一杀身成仁的结果，并坦然人设法营救自己。他在信中特别叮嘱家人们不要将他被捕之事告诉曾经的“友人”——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于右任等人，更不要请他们出面营救。主要原因在于，他深知自己“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不愿“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刘伯坚的这种向死而生，书写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彰显了伟大的人格力量。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伯坚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写道“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憾”，表露出“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决心。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

刘伯坚“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四川的家“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鉴于三个幼子的养育还需要累及兄嫂，为此他信中恳请兄嫂的明达和理解，“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了家和一个人”。刘伯坚等革命先烈身上展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奉献精神，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是刘伯坚对自己短暂一生最好的总结。刘伯坚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紧密相连，毕生不懈追求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即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亦从不后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全国人民也要不忘初心，不忘我们的革命宗旨、革命理想，不忘我们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书写无愧革命先辈的精彩华章。 □董洁

# 羲之爱鹅

羲之欣闻山阴有道士养鹅道“夺鹅”，见人拿东西就眼红，扑上抢夺，甚为有趣，便商议购买。“夺鹅”主人沉吟片刻，恭敬提议：“麻烦您抄写《道德经》交换吧。”羲之随陶然抄写，易之。“夺鹅”临行前，愣是“嘎嘎”振翅，欲扑抢新抄书，道士哈哈大笑，怀抱《道德经》匆匆离去。又闻老婢怪怪，鸣唱声音高亢婉转，羲之寤寐思之，择日前往欲购买。老婢乐呵呵，烹鹅待贵客，羲之望着热气腾

腾一盆鹅肉，摇头叹息弥日。羲之爱鹅，文人雅事，陶冶情操，传为佳话。他从鹅态、行走、游泳等姿势，领悟执笔姿势，体会运笔奥妙。他执笔时，食指指鹅头昂扬微曲，运笔时像鹅掌拨水，精神贯注于笔端。“羲之爱鹅，渊明爱菊，茂叔爱莲，靖节爱菊”并称“四爱”。“四爱”题材常现明清、民国瓷器绘画中，彰显文人高士清雅飘逸，迥出尘俗超然情志，热爱自然和谐相处。 □曹锋



作者与魏巍(中)、朱子奇(右)在一起

又一次捧读那本绿色的小书——《飞向世界》，白色的和平鸽在云朵上飞，我的心儿也在飞……那是朱子奇先生在1992年4月亲笔题签送我的，又在我笔记本上题下“难忘的延安情”的温暖话语。看着封面，不由联想到年少时那风靡全国的和平鸽，我与那位可敬可亲的老人的心仿佛融合在一起。

那是1992年4月16日，魏巍、朱子奇、马烽、邹秋帆、丁宁等中国作协老作家访问团来延安，我奉命负责陪同接待。从车上走下一位硬朗的老人，他自我介绍：“朱子奇，我是延安人！”

啊！他就是朱子奇！闻名的“国际诗人”。诗人臧克家曾十分称赞子奇的诗，认为他的诗作独树一帜，尤以政治抒情诗驰名于世。诗人贺敬之曾言，子奇是一位早于我的“老延安”，是一位永葆青春的革命诗人、人民的诗人。

我激动地反复打量他，高大的身躯透出矍铄，一句“我是延安人”让人在尊敬中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此后几天的共同生活中，多年养成的记者习惯让我见缝插针地与他攀谈，挖掘那些尘封的往事。

他出生于湖南汝城，曾亲眼目睹了姑母朱春荣（中共党员）被敌人押赴刑场时宁死不屈的形象，又亲眼见到朱德将军过汝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在朱氏祠堂挂匾“天下第一家”。这两件事，给他一生留下难忘的印象。他1937年带着徐特立老人写的介绍信和几首诗到延安，1938年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知道，那时延安十分困难，就问他：“你们那时写诗在那里发表？”

他笑了笑说：那时没有报刊，我们抗大爱好诗教的魏巍、胡征、周洁夫、梅行、张沛等教职员成立了“战歌抗大分社”，主要负责人是柯仲平，编了一个大型诗歌墙报，自己写、自己抄，贴在球场旁的墙上，吸引了许多人来这里参观。1939年，我和郑律成创作的悼念白求恩的歌，就发表在党校的墙报上，同时在追悼会上演唱引起轰动。毛主席在抗大作《论持久战》报告时，专门看了我们的墙报，称赞“好得很！抗大出抗日军人，也出抗日诗人！”从此，街头诗、朗诵诗闹得热火朝天。1939年，萧三从苏联回来，主编出版了铅印的《大众文艺》，毛主席题写了刊名，我的第一首国际题材的诗《十月》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延安成为诗的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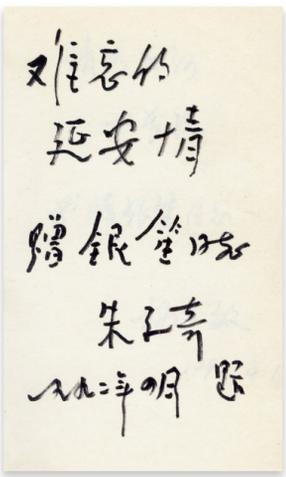
说老实话，之前我对国际题材的作品兴趣不大。一是觉得有些遥远，二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出国是不敢有的奢望，因而曾幼稚地问他怎么不多写些国内生活的诗呢？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的诗是我的武器，诗和我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一句话20多年来常浮现在脑海中，也融化在我的行动中。

为了深入地了解他，我努力搜寻他的作品，知道在延安八年，他发表了《延河曲》《杨家岭出太阳——毛泽东颂》《我歌颂伟大的七月》等，其中不少是反法西斯的战歌，如：《飞蛾扑火的故事》《起来！保卫莫斯科》《反法西斯进行曲》《百团大战进行曲》《我的心飞向莫斯科》……他被大家称为“反法西斯诗人”。1945年10月间，朱子奇奉命单独带报员赶往苏联红军前线指挥部，配合我地方武装，追歼顽固日伪残余的最后一仗。1946年2月，他回到张家口，把苏军赠送的大量俄文书交华北联

# 七月的和平鸽

诗。这些，都只为我着：让爱，能一点点挤走恨；让喜，走一步步占领愁。”他的视野里，有风云舒卷的变幻的现实，也有并未远逝的沉重的历史，这也成为我后来写诗作域外题材的航标。

重读《飞向世界》——记第一次参加国际笔会、记巴黎国际笔会、访罗马尼亚、西欧三国、美国、日本、高尔基、斯特朗、尼扎姆丁、古丝坦·伏契科娃……异国的见闻、浓浓的情谊，主题都凝结成“和平——星球的希望”。正像著名作家康濯在“代序”中所说：“我认为作者所记录的国际风云的变幻与文学交往的浓情，既同时代紧密相连，又将中国与世界贯穿一体，目光朗朗，感情真挚，知识也较丰富，特别是记事与抒情结合交融之处，更不乏引、动人、迷人的艺术魅力。”和平是他终生追求，爱与喜是他生命的动力。我想，如若他看到叙利亚战火和乌克兰骚乱，肯定又该写出感人肺腑的诗篇。 □银笙



难忘的延安情 赠银笙 朱子奇 2019年6月